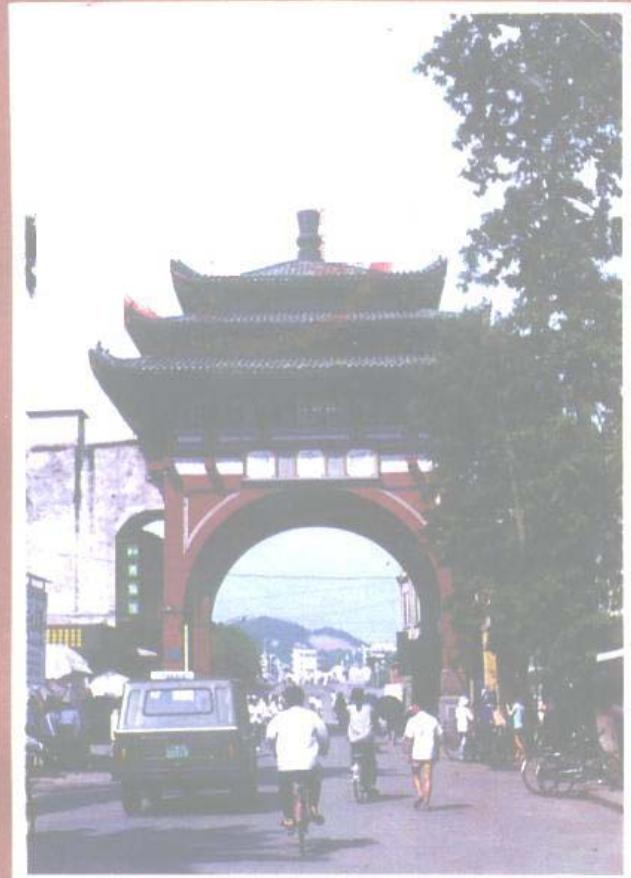


19.05

襄公风采堂神游



韶关文史资料

第十七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广东省韶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襄公风采誉神州

韶关文史资料·第十七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广东省韶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九二年二月



北宋名臣余靖(襄公)画像

(1000—1064年)

借鑒古今方史

繼往開來

周昶

二〇一一年三月

市政协主席周昶题词

襄公夙采
先照千秋

壬申春

饶紀寰



市政协委员、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饶纪寰题词

目 录

文才武略 风采流芳

- 宋代名臣余靖略述 邹捷中 (1)
竭忠直谏的一代名臣——余靖
——为纪念余靖992周年诞辰而写 苏广贊 (15)
励精图治 功业永存
——谈余靖的一些施政思想 何丽雯 (36)
北宋杰出的政治家余靖 龚伟平 (52)
余靖镇抚南疆的经历 易行广 (68)

余靖诗系年考略 黄志辉 (78) 砥柱中流 炳烺青史

- 余靖诗纵论 王林书 (168)
集萃赞襄公 行 广 (186)

韶关风采楼 苏广贊 (194) 风采流芳万世昌 焦绍波、何星源 (205) 余靖的《海潮图序》 谢君豪、幼习 (208)

- 赠刑部尚书余襄公神道碑铭 [宋] 欧阳修 (211)
襄公桂州新城记 [宋] 王安石 (217)
武溪集序 丘 浚 (219)
韶州曹溪宝林山南华禅寺重修法堂记 余 靖 (221)

- 风采楼前后记 (碑文) (223)
重建风采楼记 (碑文) (225)
改建曲江风采楼碑记 (碑文) (227)

余靖研究资料篇目索引 廖宝凤 (230)

文才武略 风采流芳

——宋代名臣余靖略述

邹捷中

御笔亲除四谏官，传喧朝野竞相欢。
当年流落丹心在，自古忠贤得路难。
必有谋猷裨帝右，更加风采动朝端。
世间万事俱尘土，进取功名久远看。

这是宋代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蔡襄赞美余靖等人耿直风格的一首诗。“风采”二字源出于此。明朝弘治十年（1497年）春，韶州知府钱墉为纪念余靖在朝时处事待人之风采，始建“风采楼”。1933年重建，楼高21米，横跨通衢，重檐翠瓦。原与纪念张九龄之“风度楼”相对，现风度楼无存，风采楼巍然耸立。楼上三字石匾，是明代著名学者陈白沙（献章）以茅龙笔书写的墨迹镌石。风采楼现已成为韶关的特别标志。海内外慕名前来瞻仰者甚众。

余靖，字安道，号武溪，宋真宗咸平三年（1000年）出生于曲江（今韶关市）。他自幼勤奋好学，博览群书，不论历代史记、杂家小说、阴阳律历、释道经卷，无所不读。他于宋仁宗天圣二年（1024年）登进士第，授官为赣县尉，以书判拔萃，提为新建（今江西南昌县）知县，再升为秘书丞。以后，历任集贤院校理、右正言、知制诰等朝官；三使辽、夏，通晓契丹语；两度被贬，先后出任吉州（今江西吉安）、

虔州（今江西赣州）、潭州（今湖南长沙）、桂州（今广西桂林）、青州（今山东青州市）等地方官员。史称他经制五管前后十年，凡治六州。及至晚年，宋仁宗进封他为尚书左丞知广州，兼广南东路兵马都钤经略安抚使。嘉祐八年（1063年）宋仁宗病死，英宗即位，次年，改元治平元年，拜余靖为工部尚书。因积劳成疾，卒于金陵，享年65岁，归葬于曲江龙归成家山。英宗闻之，辍朝一日，以示哀悼。朝廷特赠刑部尚书衔，谥襄公。

余靖一生，不但为官清廉自重，刚正不阿，而且学问造诣高深，在政治、文化、经济、科技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的遗产。嗣子余仲荀等将其遗稿汇编成《武溪集》20卷，《余襄公奏议》五卷、《三史刊误》40卷、《庆历正诞国语录》一卷、《隆兴奉使审谕录》及《新建图经》若干卷，堪称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份优秀遗产。他不愧是岭南继张九龄之后又一位扬名之士，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、外交家，是颇有成就和影响的学者、诗人。

犯颜直谏 建策匡时

余靖从江西晋升入京后，任秘书丞，掌管典籍，起草文书。景祐元年（1034年）先后多次上书仁宗皇帝，指出班固的《汉书》有许多谬误之处，建议校勘。宋仁宗便命他主持校勘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、范晔的《后汉书》和班固的《汉书》等三部史籍。他在校勘的基础上，写出了《三史刊误》40卷。随后，被升为集贤院校理。

他在研究史书的同时，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。当时，北宋王朝建立了中央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。但是，统治集

团内部，经常发生朋党斗争。“庆历党议”就是一个典型。宋仁宗景祐三年（1036年），礼部员外郎范仲淹向皇帝献上《百官图》，指出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，后又写成“四论”（即：《帝王好尚》、《任贤任能》、《近名》、《推委》）上献皇帝，引起吕氏的忌恨，竟反诬范仲淹越职言事，离间君臣，引用朋党。仁宗听信谗言，把范仲淹贬为饶州（今江西上饶）知州。这时，朝廷官员噤若寒蝉，深怕连累获罪，唯独任集贤院校理的余靖，敢于为范仲淹鸣不平，越职上书，指出：“仲淹秉朴忠之心，怀直谏之节，不识忌讳，有可矜悯。观其临事不苟，言必忤上，竭忠奉国，夫岂私其身哉！”^②甚至对仁宗登极以来不能纳谏用贤、昏庸卑劣之举加以谴责。可是，这一愚忠不但没能感动仁宗，反使仁宗恼羞成怒，将余靖贬为监筠州（今江西高安县）酒税。馆阁校勘欧阳修和太子中允尹洙也因营救范仲淹而一起受贬。但有一位谏官高若讷，虽有进谏之责，却对仲淹被贬熟视无睹。馆阁校勘蔡襄作了一首《四贤一不肖》诗，赞誉范、余、尹、欧阳四人而讥讽高若讷。他称赞余靖“词科判等屡得隽”、“气虹万丈横天衢”、“举噬不避萧斧诛”、“吾知万世更万世，凛凛英风激懦夫”。这首诗风行一时，人们争相传抄。余靖也因此名声大震。数年后，仁宗召回范仲淹及其余受牵连的人。余靖以照顾年迈父母为由，请求调任英州（今英德县）为知州。不久母死，他服丧三年。庆历二年（1042年）才重新回京城开封。

庆历年间，已经建立80多年的北宋王朝腐败无能，“吏司因循多失职”，外交上对辽夏用兵失利，屈辱赔款，政治、经济危机日益加深。在严重的内忧外患中，宋仁宗慨叹“大臣无一人为国了事者，日日上殿何益！”于是，余靖被

起用为谏院右正言。同他一齐被起用的有欧阳修、王素、蔡襄等人，使言朝政得失，建策匡时。面对宋朝危机四伏，余靖认为整顿吏治是当务之急，他说：“臣以为国家之务，京城择诸司之长，边鄙择将帅之材，牧民选循良之官，理财委明察之吏，则兵农刑政，庶职皆修矣。”^③主张“去贪残之吏，抚疲瘵之民，此诚致治之本也。”^④他奏请皇帝储粮备荒，认为“天下无常安之势，无常胜之兵，无常足之民，无常丰之岁。由是古先圣王，守之有道，制之有术，倘有缓急，不可无备”、“每遇灾伤赈贷，使国有储蓄，民无流散者，用此术也。”他指出“昨（庆历二年）来遭旱，州军司农寺至今未曾指挥出粜斛斗，伏乞指挥司农寺遍牒诸路州军应合出粜斛斗去处，并仰疾速开仓，减价出粜，无使人民失所。此实惠民之急，经国之要者也。”^⑤“古者三年耕，必有一年之蓄；九年耕，必有三年之蓄。国无三年之蓄，曰国非国。故虽尧水汤旱，民无菜色者，有备灾之术也。”^⑥他主张免减赋税，认为“农收有限，当量民力而取之。”“今若同取，一旦不堪其求，必致流亡之患，则永失常赋矣。”“当今备灾之术，最急者宽租赋防盗贼而已。”“衣食不足，虽尧舜在上，不能使民不为贼盗。”“若待有逃亡然后赈救，将无及矣。”^⑦余靖的这些政见，深刻地阐明了赈灾安民与稳定社会的关系，规划出一幅治“乱”的蓝图。虽然仁宗对余靖的这些奏请没全部接纳，但是，余靖关心民瘼，安民为本的思想，在朝廷有一定影响。欧阳修称赞他“感激奋励，遇事即言，无所回避，奸谀权幸，屏息畏之。”大有唐代张九龄公忠体国，耿直清廉，守正不阿之风，被誉为“异代九龄”。

他善于处理民族矛盾。对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，历来主

张和睦共处。对动乱较多的湖南、广东、广西等地整治有方，多有政绩。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湘东瑶民骚乱，朝廷发兵进剿，“近山之民皆杀之。其不杀而幸存者，又禁其耕。千里之民，皆失其业。”余靖严正指出：官兵枉杀良民，实是“驱民为盗”，因为“千里之民，皆失其业，若不归贼，将何所归？”^⑥由于余靖对待少数民族采取招抚安民的策略，使人民休养生息，同时，整肃军令，严禁掠杀百姓。这样，为时数载的湘东瑶民骚乱便得到平息，之后他在镇抚广南期间，又力行对壮、瑶、苗、黎等民族安抚政策，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，使战乱地区向稳定，共同发展生产。因此，他在华南少数民族中享有很高的威信。

临危受命 外交勋著

余靖不但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，提出了许多正确的谋略，而且在外交方面，对维护国家主权的尊严和安全，也显示出了卓越的才能。

北宋建国初期，契丹族所建立的辽国多次进犯宋境，宋军屡遭失败。宋朝廷被迫请和，达成协议，每年向辽国输纳大量银两和绢匹。景祐四年（1038年）依附辽国的西夏国主元昊称帝，要求宋朝承认并册封帝号。宋朝下诏削去他的官爵，并要逮捕他，因而引起西夏与宋之间的战争。宋兵连遭失败。在宋、辽、夏互相对峙，三足鼎立的形势下，为了扭转宋朝不利的局面，余靖认为应使辽国和西夏互相牵制，避免“二境受敌”。他临危受命，于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10月出使辽国，祝贺辽国母正诞。翌年，辽兴宗征西夏，元昊恐

两面受敌，便向宋称臣；而辽国则胁迫宋与西夏绝交，使西夏孤立。当时宋朝廷内意见纷纭，有的主张接受辽兴宗的要求，与西夏断交；有的则主张如果西夏能向辽请罪，应允许它向宋称臣。余靖对这两种意见都不赞同，认为“徇北虏而绝西戎，亦有兵祸；纳西戎而违北虏，亦有兵祸。二虏连谋，共为矛盾之势。北人才去，西人必来。拒纳之间，动皆有碍。”因此，他提出“逊词以谢北虏（辽国），缓词以款西戎（西夏）”^⑨的策略，对辽夏两国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，静观局势的变化，争取主动。不久，当他看清辽国的意图后，便主张允许西夏向宋称臣，而专力对付辽国。庆历四年（1044年）5月，为回谢契丹使者，余靖第二次出使辽国。回国后，即将敌情详细分析，建议朝廷利用辽夏两国的矛盾，对元昊速行册封。他说：“臣又详观二敌形势，唯有速行册封，使元昊得以专力东向，与契丹争锋，二敌兵连不解，此最中国之利。”^⑩次年正月，余靖第三次出使契丹。他深知把握时机的重要性，便针对朝廷在对元昊册封问题上摇摆不定的态度，进行利害之辩，指出“倘或朝廷怀犹豫之心，谋不早定，则事久变生，非我之利”。^⑪经过余靖的一番分析，宋仁宗下决心册封元昊，使西夏解除对宋的后顾之忧，倾全力与辽血战。结果，西夏屡败，向辽称臣。经历6年的辽夏交战，两国元气大伤，均无力侵宋。宋辽、宋夏边境才得到较长期的稳定，人民少遭战祸，而宋、辽、夏三国亦由此奠定了恢复和平的基础。

余靖三次出使契丹，“单车即道”、“握手以往”，外交策略十分高明。他在出使辽国期间，写了一首“番语诗”，句句嵌用契丹语：

“夜宴辽侈（热烈）臣拜洗（受赐），

两朝厥荷（友好）情俄勒（深厚）。
微臣雅鲁（跪拜）祝若统（幸福），
圣寿铁摆（崇高）俱可忒（无疆）。”

这首诗表达了友好情谊和祝愿，既“通情”而又不“屈礼”，献给辽主，辽主大喜，亲自捧起大杯酒回敬。余靖外交得体，使得“戎盟两就”、“国体获伸”。这本来应该记功行赏的，但在庆历五年（1045）5月，侍御史王平及监察御史刘元瑜等人，借口余靖用番语作诗，“有失使者体”，把他贬出朝廷，降任吉州（今江西吉安市）知州。

在革新派的大臣中，余靖是最后离开中央朝廷的一位。他一直信赖仁宗，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仁宗身上。可是，仁宗听信谗言，冤屈了余靖等人竭智尽忠的贡献。余靖一腔热血，满腹悲愤，自感报国无门，便只好借父丧申请隐退回家。

抚民治吏 安国兴邦

宋皇祐四年（1052年）广西广源州爆发了以侬智高为首的动乱。当时，宋朝因西戎扰攘而将全力倾注西北，而岭南兵备薄弱，使侬智高乘虚而入，接连攻破九个州郡，直下广州，震动朝野。那时，余靖因父丧居家。为平定边乱需要，又受命为知桂州（今桂林市）广南西路安抚使，与狄青、孙沔等共同作战，平定了这场动乱。侬智高本壮族豪帅，自兵团广州后，所经该路四州一府烧杀掳掠，满目疮痍，对社会经济破坏很大。但余靖本着对待少数民族的一贯方针，在他所统辖的26个州内，推行安抚政策，极力联络各州首领，封以官职，厚赐礼品，使之安心任职。防止了过去宋兵

滥杀无辜的现象，从而得到了各州首领的信任。广西平定后，余靖留在邕州（今广西南宁市）制订休养生息措施，安抚流民。他从整顿吏治着手，与各级官吏约法三章，重申他在庆历年间在京师为官时所制订的《从政六箴》，要求各级官吏清廉、公正、勤勉、明察、宽容、慎重。他起用了一批刚直廉明的清官，上报朝廷惩办了一批徇私舞弊的贪官，撤换了一批不称职的冗官。这样，一年后，“抚辑完复，岭海肃然”。余靖亦擢升为集贤院学士，先后任潭州、青州知州，再升吏部侍郎。

嘉祐五年（1060年）交趾（注：也作交趾，北宋时对安南、越南的别称）人申绍泰率兵5000余人入侵邕州，杀宋朝5个巡检。朝廷特命余靖为广西安抚使，并下令荆湖兵众，全部调到交趾边境，摆开战阵，发文告召交趾用事臣来见，严加诘责。交趾王李日尊怯于余靖的军威，诚惶诚恐，俯首请罪，并交出杀害宋巡检的5名罪犯，在钦州当着两国人民之面将其斩首示众。从而和平解决了边境战乱，维护了国家的尊严。

嘉祐六年（1061年），余靖以尚书左丞知广州，兼管内劝农市舶使、提点银铜场公事。广州一带物产丰富，一向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，历代到广州做官的，往往搜刮民财，宦囊饱满。余靖曾奏请朝廷下诏，严禁官吏“购南药请番货”，以保证国家收入。他又奏请朝廷免除外国商船在广东海岸装货的附加税，以活跃进出口商业。于是，来往于广州港口的外国船舶络绎不绝，日益增多。他还提倡教民识礼知法，刑法简而不苛，提倡轻车简从，破除官场中迎来送往、讲究排场、铺张浪费的恶习。余靖在知广州任内，“不载南海一物”，真可谓清廉自重了。

扬美抒愤 骚雅声远

余靖好学深思，博览强记，既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、外交家，又是一名古今同崇的学者。他虽然政事军事较忙，但常以诗文自娱，即使弃官乡居，亦寄情山水，诗作更多。他的诗被编入《武溪集》的有135首，另补佚4首，共139首。《粤东诗海》评论他的诗“骨格清苍，吾粤宋诗无出其右”；《宋诗钞》也认为余靖的诗“坚炼有法”、“弃华取质”。《岭南诗存》赞余靖的诗“清婉”。《岭南历代诗选》评余靖五言诗“颇受张九龄的影响，幽深清劲，有骚雅之遗音。”

余靖写诗，正如他在《孙工部诗集序》所说的“有美必宣，无愤不写”。他所处的时代是变革的时代。他主张革新，在冗繁的政务中，希望通过诗歌扬美抒愤，“唯歌生民病，愿得天子知”（白居易诗），为勤政惠民、诛奸除弊设置理想境界。因此，在他的诗中，有山川风物的自然美，有挚真诚笃的感情美，有坦荡豁达的风采美；同时，有伤时疾世的忧患之愤，有孤寂宛结的抑郁之愤，有嫉恶奸邪的悲慨之愤。

歌咏山川风物赞美自然的诗，大多写于从政初期和两次返乡家居期间。这些诗表现了诗人对祖国壮丽河山的赞美和对家乡自然风物的热爱。

“草带全铺翠，花房半坠红。农家榆荚雨，江国鲤鱼风。堤柳绵争扑，山樱火共烘。长安少年客，不信有衰翁。”

这首《暮春》是天圣二年（1024年）写的，那时正是余

靖踌躇满志，英气勃发的年华。他赴河南开封参加举试，等待公榜之时，为京郊的草带、花房、堤柳、山樱、榆荚雨、鲤鱼风等清新明丽的景物所感染，活画出一幅江南农村的暮春美景，色彩浓烈，生气盎然，反映出诗人积极向上的情怀。诗的尾联，表现出诗人对这次举试和对未来前途充满自信，深信自己不会象智竭体衰的老翁。

这类诗，在乡居期间写得最多，正如周源在《武溪集序》所说：“夺官屏居曲江凡六年，游山水，益自肆于文学。今集中诗，多此六年之作”。其中一首《山馆》：

“野馆萧条晚，凭轩对竹扉。树藏秋色老，禽带夕阳归。远岫穿云翠，畲田得雨肥。渊明谁送酒，残菊绕墙飞。”

这首诗写于皇祐元年（1049年）秋，在这以前的几年里，余靖出贬乡居，对农村的田园生活已逐渐适应，心情也慢慢变得平和。诗中以质朴中见清绮的语言，描绘出秋日傍晚的山村景色，塑造出一个悠闲自得的自我形象。“寓闲旷之目，托高远之思，一切深沉的思考，都蕴藏于无言的远眺之中。”^⑫尾联以渊明自况，表现出恬静澄淡、清高绝俗的心态。

唱酬、应制、送别怀思的诗，在余靖的诗歌中占有一定的比例。这些诗大多是珍重友谊、前程互勉的作品，感情真挚，意境高远。如《送江秀才归庐陵》：

“感君千里远相过，晤语经旬接粹和。
上客杯盘只炊黍，主人门巷正张罗。
海山雾暗红尘少，岭路梅黄细雨多。
日暮津亭送归恨，唯知极目望烟波。”

这首诗是庆历七年（1047年）初夏所写。江秀才是诗人